

鄧喬彬學術文集

第四卷

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上）

邓乔彬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文集由晨讯科技集团、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赞助出版

鄧喬彬學術文集

第四卷

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(上)

邓乔彬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潘 安 祝凤霞

装帧设计:丁奕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词艺术发展史.上/邓乔彬著. — 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.8
(邓乔彬学术文集;4)

ISBN 978-7-5676-0146-8

I. ①唐… II. ①邓 III. ①唐宋词—词曲史—研究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0297 号

唐宋词艺术发展史.上

邓乔彬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

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

E-mail:asdcbfxb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32 插 页:4

字 数:681 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0146-8

定 价:65.00 元(平装) 75.00 元(精装)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总 序

孔子说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我今年七十周岁，应以之对照反省并思考其中原因了。

孔子以六艺授徒，实行全才式教育，我于1956年考入华东师大附中，勉强可算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却已开始偏科。试前突击可考数、理、化优良，日常所好却为文哲、史地与艺术。高中再入师大附中，不久就被调到区体校，虽安排就读于同是名校的复兴中学，兴趣使然，偏科更为严重。直到高三，情况始变：体校为兼顾运动会得分和高考录取率，全班仅剩十七人，在最小的教室上课，一流老师讲课，我虽近视未戴眼镜，仍看得清又听得明，能集中思想学习。我不仅是文、史课代表，空间解析几何、有机化学等课程的测验、考试也几为全优。学业之进，使我误以为自己能做到文理兼长，因看到了历年对《红楼梦》研究、对胡适思想、对诸多文艺现象和人物的批判，深感“文科危险”，于是，在高考的选择上，决定报考理工科。我有绘画之长，又爱制作船模，原欲报考同济大学建筑系或上海交大造船系，后来却突然生变。原因是：在六月举行的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体校组比赛中，我获得跳高冠军和三项全能亚军，被观战的华东师大体育老师相中，劝我报考师大。他告以师大物理系毕业生多分配至高校或科研单位，到中学的仅百分之五。而因经济困难，我曾对父母许诺读大学不要家里负担，师范生由国家提供膳食，能不爽所约，故而听从所劝，改以华东师大物理系为第一志愿，并被录取。

入学后，开始还信心满满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却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。尤其是高等数学，常布置几十道题，有时竟然半天也解不了一题，使我深感烦恼。有次实验，一女同学失手损坏了仪器配件，被命赔偿，她的痛哭使我难以平静，就此视实验为畏途。我住在运动员宿舍，见文科生毫无作业、实验负担，同室一位羽毛球队员读中文系，是印尼归侨，曾说：“我们的同学真厉害，高中就读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！”听此叹慕，我心中暗笑：“这些小说，鄙人小学时就读过了，岂

止读过，人物和情节都能随口说出！”我深感文理科的苦乐不同，心想：“毕业后拿一样的工资，何必要读物理系？学得如此之苦！”为此，因高考弃长取短、选择了理科而后悔，开始有转系之念。

那时的高校，转系极难。我先向物理系提出转读中文系的申请，未得理睬。后听说，有一数学系转中文系的学生，曾向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信，历尽周折才得批准，且必须从一年级读起。我当然不愿去中文系“留级”，更不愿在物理系勉强升级，决定破釜沉舟、“舍命”一搏。于是，所有的专业课都亮起“红灯”，以证我不宜在物理系学习；同时，正式提出转读中文系二年级的申请。在受阻于物理系、教务处之后，我决定写信给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，申明要求转系的理由。常溪萍抗战时入党，曾是山东的模范专员，保持老八路本色，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、食堂和运动场，爱打篮球，曾多次看我跳高，认识我。我刚入学，就在新生运动会上破了校纪录。1963年参加高校运动会，所有高度都一次过杆，最有希望夺冠，却在跳1米86时，心想过此高度将集冠军、高校纪录和一级运动员于一身，杂念一生，三跳失败，仅获亚军。虽如此，我仍是华东师大田径队的“希望之星”。我候在丽娃河桥畔，见他经过，把信交他手上，只说：“常校长，这是我要求转系的信。”转身就走。不久，教务处约我谈话，认真听取我要求转系的理由，后又同意我参加中文系考试，以决定能否转读二年级。事后得知，这是奉常校长所命而办，而常校长之所以同意我转系，主要不在于我是学校的优秀运动员，而是通过查阅高考作文卷，知我所写《雨后》一文似是得了理科生的最高分，这是可以转读中文系的重要理由和依据。

因期末考试已过，我被安排参加中文系一年级的补考，所有课程都通过，优多良少，我终于没成为“留级生”，在1963年下半年转到中文系二年级就读。这年冬天，成为一级运动员，自感学习上驾轻就熟，大有余力读书。次年春，我以1米92打破1米86的上海高校跳高纪录，距新的运动健将标准仅3厘米，是全校最有希望成为健将的人选。我开始酝酿学习与体育双优的计划，期待毕业能留校工作，走上高校教学和文学研究的道路。

但是，在中文系仅读了一年，1964年10月，全年级同学就被命参加“社教”工作队，到安徽农村搞“四清”。先是“访贫问苦”、“扎根串连”，后是“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从全椒县到定远县，先后参加了三期运动。1966年5月，结束“社教”，恢复了大学生身份，

回到学校。但随即“五一六”通知下达，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真正拉开序幕，我在无“学”、不“学”的大学度过了“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”的两年多。好不容易在被拖一年后，于1968年毕业分配。五年制的大学六年毕业，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物理系，一年中文系，在“四面向”（厂矿、农村、基层、边疆）的潮流中，被分到甘肃永登水泥厂。服从建材部安排，我于1968年9月到江苏南通长江边的东方红农场，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。战天斗地，劳动一年半，于1970年3月结束锻炼。5月初到甘肃永登水泥厂报到，开始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接受工人阶级的永久性再教育。

我先被安排随政工组挖防空洞，后到原料车间，每天推小车，数月后，再被分到班组，当了三班倒工人。一年多后，职工子弟小学一位体育教师调回老家，厂政工组找我谈话，令去学校顶缺，理由是我不久前获兰州市首届运动会跳高冠军，教体育很合适。我认为自己虽能当专业教练却教不了小学体育，在压力之下还是顺从了。每天面对小麻雀般的一二年级小学生，和“我们今天玩什么”的发问，我只能摇头苦笑，唯求不出意外，何有教学可言！一年后，我改任职工子弟中学的军体课，课馀还曾满怀热忱训练学生田径队。后被同事告知：校长对我教体育穿运动鞋和运动服、戴太阳帽（均自费购置）很不满，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，差点过不了转正一关。在教了近两年军体课后，我“归队”当语文教师，而因“阶级”的嫌疑，冷却了对学校体育事业的热心。

很快就到了“而立”之年。难出于时代之外，此时的我是不“学”又未“立”。应付每周十二节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，每周三个晚上的学习毛选、马列，是极其容易的。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，不必“给人一杯水，自己要有一桶水”，此时除了马列、毛选，实在无书可读，我仅是利用为厂文艺宣传队创作节目的机会，借口找参考书，在厂图书馆发现了几本藏在角落的外国小说，读了以前未读过的梅里美《嘉尔曼》、《高龙巴》等书。

黄土高原的杨树叶生生落落，我的生活在“看人儿女大，为客岁年长”中循环……终于到了1976年，周恩来、朱德先后逝世，唐山大地震，毛泽东逝世……不久，传来了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举国欢庆之后，很快就是一系列的拨乱反正。终于，在1977年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，不久又传来研究生招生的消息。“伤痕文学”的出现，促使人们反思“文革”，陈景润攻克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报告文学，更鼓舞了许

多人,“志于学”的时代终于来临了!我在1978年春报考了古代文学研究生,以母校华东师大为第一志愿,在永登县城参加考试,除俄语外,其他三门课自感较好。在等待中得到了复试通知,却因夏天的洪水冲断宝天铁路,只能向厂领导申请乘飞机回沪,且不顾只准飞兰州到西安的批示而直飞上海,参加复试。9月,收到录取通知,我成为了“文革”后“黄埔一期”研究生,得以从中年开始“志于学”。

三年研究生,是我真正的读书期。深感本科六年、毕业十年的无学,蹉跎岁月之痛,激起了学习的热情。我尽废以前所好,停止了体育锻炼,渐入学术之门。1981年,研究生毕业,留校工作,既是我学术研究的继续,又是逐渐开拓的起始。很快就进入“不惑”之年,对于人生之途自无所“惑”,而对学术问题则“惑”者甚多,因之而兴趣渐广。我先是为写研究吴梅的硕士论文而用力于戏曲和曲论,后因兴趣主要在词而转向唐宋词与词学批评,以上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分别是《吴梅研究》与《唐宋词美学》二书及参撰的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,还有多篇词学论文。而因唐宋词与词学批评分别被同事设为选修课,且作为科研主攻方向,我就避之而将研究转到了古代诗画比较。这一转向并非有意作跨界研究,而是或因我青年时对诗画皆有所好的“情结”所致,此时因浸淫学术而多了几分中年的理性,虽未能用力于诗画创作,却对研究二者尤其是比较其异同感兴趣。遂从钱锺书先生的两篇论文及所提出的问题出发,写出了古代诗画比较的讲稿,以此稿开了多年的选修课,并据此而写成、出版了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一书。此书被一书评称为“中国的《拉奥孔》”,虽或过誉,但也确是点出了构建中国古代诗画比较理论体系,揭示民族特色的意旨。

《吴梅研究》初稿成于1981年,出版于1990年底,历时近十年;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成稿五年后,才于1993年出版。《唐宋词美学》1993年出版,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1994年出版。以上四种著作,都出在五十岁左右。而因前两者的出版历尽艰难,使我真正懂得学术研究成果的面世受制于市场,这就改变了以前的观念,大概可算是我的“五十而知天命”了!

虽然上述的专著、合著都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却是我八十年代“学”之所成,所以这十年之所“治”,主要是词曲与诗画之学。

1988年起,我受命参与华东师大文科第一个复合型硕士专业的筹建,开始指导这一名为“中国文化建设”方向的硕士生,又有授课的任务,

遂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文化学、文化史著作，结合我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，写成《中国文化与文艺》讲稿。除了为这一方向的硕士生授课外，又在中文系各层次、范围的学生中以选修课讲过多次。在讲述十年后，写成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一书，作为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成果，在2003年出版。在研读文化学、文化史的过程中，我一度对图腾、民俗颇感兴趣，曾费时费力地借助放大镜阅读影印版《二十五史》，企图从古史记载中寻找图腾制的遗迹，欲写《中国图腾艺术史》。此事虽未行，却因对文化学、文化史及中国古代史著作的阅读，引发对史前文艺与神话研究的兴趣。适逢中文系有人主持撰写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丛书，以人为题，确定了十位对象，将其中的闻一多研究交给我，我虽因读了俞兆平的《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》而自感难以再作全新之论，却因对闻一多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神话、《诗经》的兴趣，而将论题扭转到对闻氏的古代文学研究作文化的观照，与赵晓岚合作，写成了《学者闻一多》。

与上述研究几乎同时，我又延续了对诗、画的研究兴趣。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出版后，因感到西方是力图拉开诗与画的距离，而我国古代却着力于诗画的融合，可是，诗与画毕竟所属不同，艺术介质、手段有异，虽可比又不可比，为此而生分写《中国诗歌思想史》与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之念。我以先生后熟为原则，先作后者，全书百万字，始于1994年，因有集体项目和教学任务，主要用暑假写作，耗时四年才完成，也同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一样，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，才在成稿三年多后出版。此时，已入新世纪，同事萧华荣的《中国诗学思想史》已出多年，使我只能将另一选题调整为《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》，却因对能否出版的疑虑，令我不敢贸然动笔。而因2002年接受暨南大学之邀担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，则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，这一写作计划终未能实施。近十年之后，出版拙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的贵州人民出版社要我自报选题，争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，而此时经历了一场大病，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再写大部头著作。于是，我的诗画之学就只能终止于这种跛腿的状态了。

九十年代的十年，我的治学既延续了诗画之学而偏在绘画，又新辟了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，还在学术史范畴以学者为对象继作“研究之研究”。以上三方向的成果，就是分别出版于2001年的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，2003年的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，2001年的《学者闻一多》。三著的出版，在我六十岁左右，此时的辨识力已较前为高，虽非和

光同尘，却听到的多能泰然入耳，看到的也见怪不怪，虽无反潮流的勇气，却能不跟风而动，此或为我的“六十而耳顺”之义。

2002年底，为申报古代文学博士点及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，我被借调到暨南大学，担任学科带头人，次年，前者得批，后者未就，我正式调入暨大。河南大学出版社的《宋代研究丛书》已出多种，或因我有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之作，向我约写《宋代绘画研究》。成约于2002年6月，而因我的调动，应对多事，虽只用了半年多撰稿，成书却已在2004年8月，出版则是2006年10月了。我的学术兴趣屡转，虽不怕“学书不成学画，学画不成学塑”之讥，却因只问耕耘、不问收获，从未在各界求取认同，故似只有词学界还将我看作“自己人”，因此而有回归词界之想。我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写了《宋词与人生》，又在该社出了《词学廿论》，在齐鲁书社再版了《唐宋词美学》，以维持先入为主的词学学者形象。2004年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”获批，为应对考核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后，我在2007年一年内完成了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的百万字书稿，三年后正式出版。

我曾有二十年的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史，自三十五岁重回大学以来，为追回岁月，就停止了锻炼，虽自感体能退化，却无明显的不适，为之还自我调侃：“青年时应是狮子老虎，老年时要像乌龟王八。”而实际上我不应提前进入“乌龟王八”状态，故从中年起已因久坐不动而疾病暗生。1999年，第一个验血指标高出临界，此后各指标逐年飘红，渐成“三高”人员，本应重启体育锻炼，却停不下高强度研究的脚步。因多年的连轴转，健康严重透支，终在2009年大病一场，躺上了手术台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体育锻炼确应是一生之事，对于运动员出身的人尤应如此。悔之晚矣，亡羊补牢，却已非其时！我只能停止了将要进行的研究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不情愿地划上休止符。

从前曾流行过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口号，我的真正为学始于三十五岁，应工作到八十五岁，但因健康亮起红灯，身患多种疾病，我只能止于七十。这本是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之年，我虽不逾法度规矩，却受制于健康而不能从心所欲了。有了这一清醒认识，我只能中止原先计划，仅在出版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后，于2011年再版了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插图本，旋即开始整理三十多年的著作、论文，拟在七十周岁时出版自己的学术文集，就此将“换一种活法”，以度余生。这样，原先计划要写的几种著作都不能付之实施了。按先后，这些著作是：《进

士文化与唐诗》、《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》、《中国韵文学概论》，以及力图构建新体系、体现“一代之所胜”的《中国文化史纲》，此外，还有一或两种词籍别集的校笺。

新著写作未成，旧作整理已就，如今，名之为《邓乔彬学术文集》的十二卷本将正式出版。十二卷文集分别是：

第一卷：《文化与文艺》，包括专著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和相关论文七篇。

第二卷：《比较诗学》，包括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两个专题。前者是：专著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，古代诗画比较论文一篇，中外比较诗学论文六篇。后者是：与陈学祖合作的影响比较研究书稿《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》三章。

第三卷：《文化诗学》，包括四组论文：文化与诗，十二篇论文；进士文化与唐诗，十二篇论文；诗歌美学，十篇论文；曲学及其他，十一篇论文。

第四卷：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上）》。

第五卷：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下）》。

第六卷：《词学三著》，分别是《唐宋词美学》、《宋词与人生》、《爱国词人辛弃疾》。

第七卷：《词学论文集》，包括：词学总论，十三篇；词人词作论，十三篇；词论研究，十篇；其他，八篇。

第八卷：专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（上）》。

第九卷：专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（下）》。

第十卷：《宋画与画论》，包括《宋代绘画研究》及研究绘画与画论的论文六篇，访谈一篇。

第十一卷：《学者研究》，包括《吴梅研究》与《学者闻一多》二著，及论述二人学术成就或研究方法的论文二篇。

第十二卷：《杂缀集》，包括六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古代六十种画论著作所写的提要，第二部分是九十二篇古文的提要，第三部分为序跋后记，第四部分为学习笔谈，第五部分为发言、讲座稿，第六部分为作品赏析。最后附有作者分年度的著作、论文、文章目录。

回顾七十年的人生，恰以1978年三十五周岁为界：此前是在中学、大学偏科、移易的“志于学”与不能“学”之十多年，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数年，不能给人以学、自己亦不能学的工厂子弟学校教师的七年；

此后则是真正在高校的为学、治学，经历了不惑、知天命、耳顺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命历程、节点。十多年的蹉跎岁月，即使放弃体育锻炼及诸般爱好，也难以追回！若老天能再给我以十多年的健康岁月，本应有逾千万的文字用于结集的，如今却只能止于古稀之年而仅得六百多万字。不过，人们常说，学问是做不完的，念此也就不必自责、自叹了。

本文集的出版，先得暨南大学第三期211工程经费的资助，所缺的大半费用由晨讯科技董事长杨文瑛女士赞助，在我筹款无门、不得已而向这位从无联系的初中同学求助时，立即就得到她的无条件应允，随即把钱款打入出版社账户。对此，实在是难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！本文集的整理、出版，得我沪、穗两地历届的博士生、博士后助力甚多，分别负责各卷的整理、校核者是：

第一卷：刘兴晖、金国正

第二卷：陈学祖

第三卷：彭国忠

第四、五卷：刘兴晖、昌庆志

第六卷：吴思增、王毅

第七卷：杨柏岭、仲冬梅

九卷：李杰荣、刘兴晖、王嘉、陈建穰

第十卷：何平华、汪涤

第十一卷：李俊（委托刘晓亮）

第十二卷：程刚、夏令伟

文集能顺利出版，衷心感谢他们！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本文集列为重点图书，社领导统筹安排，诸位编辑兢兢业业，特此致谢！

围绕为学主题，回顾五十多年人生历程，权以为序。啰嗦之至，望读者谅之！

邓乔彬

2013年5月22日

本卷提要

第四、五卷收入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，因字数多达百余万，故分作两卷。

本卷所收六章，其要义是：

第一章，燕乐歌辞之起与敦煌曲子词。

概述隋唐雅乐与清乐，尤其是燕乐的发展情况，论述唐代燕乐杂言歌辞之起，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，“选词以配乐”，“非由乐以定词”的创作原则；从唐代边塞文化、爱情、婚恋与女性、社会生活与多元文化等角度论敦煌曲子词的文化内涵，以朱祖谋所说“其为词朴拙可喜 淘倚声椎轮大辂”论敦煌曲子词的艺术，并具体论其格律甚宽、同调异体、语言质朴、长于叙事、喜作铺排、抒情直切、长于比兴、多有联章体、代言体与戏剧性等特点。

第二章，唐代文人词的艺术奠基。

从宫廷文化论词的诞生与盛唐词，从多元文化论中唐词，从士大夫享乐文化论刘、白词，从进士文化的“轻薄”、“无行”论晚唐文人词。就词的艺术而言，李白“丽句妍词、意兴苍凉”，张志和与王建分得“远韵超逸”与“节短情长”，刘、白有“乐天梦得，声调渐开”之说，而皇甫松则措词闲雅、不入侧艳。温庭筠为倚声之祖，其词多为文字的仕女图，貌似雕缛满眼、境余于意，其实是强化诱情因素，主于印象、重在直觉、成于联想；韦庄词情意深厚、寓浓于淡，意婉词直、似达而郁，风格清艳绝伦，具疏爽之致。二人分开疏、密二派。

第三章，花间与南唐词的不同艺术走向。

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，《花间集》的主要题材与文化成因。将“花间”分为前后两期、三组词人。分论雅近韦庄的薛昭蕴，“飞卿流亚”牛峤，及张泌，毛文锡与牛希济；绮艳轻和的欧阳炯，“艳词上驷”顾夘，鹿虔扈、阎选、尹鹖和毛熙震；“曲子相公”和凝，自具面貌的孙光宪，另辟一境的李珣，“有思致”、创长调的李存勖。论南唐不同于西蜀的宫廷文化。忧患意识、比兴寄托是冯延巳“和泪试严妆”的成因，析其“情溢词外、意蕴言中”，沉郁顿挫、“深美闳约”特点，“上翼二主、下启晏欧”的地位；论“哀而不伤”的李璟词，以亡国后所作为主的李煜词的艺术：“粗服乱头、不掩国色”，直抒性灵、不事寄托，清便宛转、“词家王孟”，以及王国维所说“眼界始大、感慨遂深”涵义。

第四章，北宋前期词艺术的多元多向发展。

明确北宋词的分期根据，论士大夫文化的形成、特点，及其对北宋前期词的阻厄与导向。从宋初气象论丁谓、夏竦、聂冠卿，从寄托与清丽论王禹偁、寇准、钱惟演等，及较为特殊的潘阆、林逋与陈亚，以“人非太上、未免有情”论范仲淹。以晏殊、欧阳修为此期士大夫之词的代表，二人继承冯延巳而不同：晏温润秀洁，风流闲雅，缘情体

物、细妙入微,语浅而情深;欧疏隽深婉,表现闲愁宦情,“只如无意、沉着和平”因以词为“小道”,又受柳永影响,故颇多俚俗之作。柳永善写羁旅行役,长于讴歌太平,又具“宋玉情结”,有“唐人高处”,更以代表市井文化的青楼艳歌知名,“骖骖从俗”而长于叙事,“铺叙展衍,备足无余”,是慢词的创调名家,善于熔情入景,具有“上承飞卿,下开金元”的词史地位。张先词“韵高”而味隽永、适得其中而无大起落,似书法中的钟繇。仁宗朝还有宋祁、王琪、韩琦、张昇、刘潜、李冠、尹洙、梅尧臣、杜安世,各有一二名作。

第五章,北宋中期词与苏轼的开拓、贡献。

士大夫文化对此期词的影响主要有三:感叹“飘零官路,荏苒年华”,努力化解思想矛盾,体现了雅俗结合的创作观。司马光、王洙、舒亶、王安石、王观、曾布、魏玩所作,见证了此期的守成与突破。晏几道置身主流文化之外,以真情与韵致见长,微痛纤悲中蕴无限伤心,淡语有味、浅语有致,为“花中文杏”。苏轼将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,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”,吟咏情性,寓意高远;他的“以诗为词”是:题材上“无意不可入,无事不可言”,风格上“刚亦不吐,柔亦不茹”;苏轼的“豪放”源于阳刚阴柔说,因天资不凡,故辞气迈往,有“文自为文,歌自为歌”的特点。黄庭坚受苏轼影响,意境、风格较相似,部分如己诗之瘦健精险,其俚艳俳狎之作,被视为北曲先声。秦观有独到的“词心”,受累于党争,“情钟世味,意恋生理”,将“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”,人以之辞情相称、酸楚凄婉,俊逸清新、和婉醇正,也有俚俗之词。晁补之与苏轼为近,以神姿高秀、沉咽雄邈见长。仲殊与陈师道词分有“脱尽寒俭”和“僻涩质朴”的特点。

第六章,北宋后期词的艺术发展与集成。

此期论主要创作期在徽宗朝的词人,而不以年龄分。苏门外围词人渐见艺术之变:李之仪清婉峭蒨、渐近沉著,赵令畤婉约风流,惠洪清俊通脱,毛滂间有雅调,王安中清丽芊绵。贺铸词有较多的创意与艺术开拓,因沉抑下层,难展其才,故所作颇有屈宋之旨,见骚情雅意,体现其“格见成篇,气出言外”原则,笔势飞舞又变化无端,风格兼有盛丽妖冶与幽洁悲壮。周邦彦知音律、善制曲,言情体物,穷极工巧,长于铺叙,重视法度,所作具有开阖动宕、回环往复之妙,善于以六朝小赋与唐诗入词,风格富艳精工,集北宋词艺术之大成,转自然为精能,收柳秦而开姜史,是承前启后的词人。此期的大晟词有知音守律之长,却“颂圣贡谀,病于无韵”,谐谑词“滑稽无赖”而以谐谑嘲讽为特色。

自序

词起于唐代,有人甚至上探六朝以究其源,对于词学,亦有上溯之论,如胡丹凤《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序》云:“词学萌芽于唐,根柢于宋。”而实际上,词之为学应是肇始于宋,延续于元明,而尤盛于清。北宋杨绘《时贤本事曲子集》被认为是最古的词话,李清照的《词论》则是更为著名的词学理论,南宋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了词的总集、选集、别集等逾一百三十种,并逐一作出评价,由宋入元的张炎作《词源》,所探讨者兼及词乐与作法,是词的乐律论、创作论的系统著作,标志着词作为专门之学的开始。明代的张纘撰有《诗馀图谱》三卷,是现存最早的词调谱,又提出婉约、豪放二体说,对后来词的体派论影响很大。至清代,四库馆臣虽未脱“小道”观念,将词曲入于集部之末,谓:“二体在文章、技艺之间。厥品颇卑,作者弗贵,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。”“其於文苑,尚属附庸,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。”然而却终不碍词学之大昌。有清一代,仅词话就有五六十种,浙西、常州二派,先后各有编选及理论标举,后者的影响更及于现代。晚清词学进入近代期,进而发展出现代词学。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龙榆生在《词学季刊》第一卷第四号发表《研究词学之商榷》,列举了三百年来的词学成就,分别以万树的图谱之学,凌廷堪、方成培的音律之学,戈载的词韵之学,张宗橐的词史之学、朱孝臧的校勘之学为代表,并主张另创声调、批评与目录之学。以其所见,完全的词学应由“八学”和“三义”构成,这也代表了当时对词学作为系统工程的认识,是现代词学应有之义。

虽说我国的传统学术有自身的体系和特点,但由于现代学术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生成的,因而确实不同于旧学。钱穆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·序》云:“文化异,斯学术亦异。中国重和合,西方重分别。民国以来,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,务为专家,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。”虽说晚清时期通儒尚多,但仅就词学而言,对于王鹏运、朱祖谋、况周颐、郑文焯诸大家,已是各有所司的专门之学。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,以夏承焘、唐圭璋、龙榆生、任二北、胡云翼、刘永济、俞平伯、詹安泰等先生为代表的词学家,都具有全面的素养,而所治词学,仍是各有侧重。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一代词学,在前人所治文献的基础上,又有较大的发展,仅以现代意义的词史著作而言,已与张宗橐的《词林纪事》大异,且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问世。但是,新时期以来虽也有涉及各子学科的通论性著作,可由于词学的专门性太强,很难逾越“分门别类,务为专家”之限。

基于对词学概念的认识,有感于词学界多年来虽有多部词的通史、断代史、流派史问世,出于对词为“倚声”的认识,亦有词与音乐关系的专论,但迄今为止,尚未见全面论述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史,为此,我常感到不无遗憾。千年时光带不走时代的印迹,

作为文艺作品,唐宋词除了可作为社会史、心灵史来认识,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外,尚应注重其艺术手法、形式本身的发展史;而词不仅是广义的诗歌的一种,又是倚声而歌的歌词,因此,尤应关注其与音乐的关系。对此,我一直有个愿望:有志于完成一部专论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著。在2004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》获批后,这一愿望得以实现,三年多后,写成本书。

就通史的写作而言,对于历史的发展究竟是否有规律可寻,怕很难作出绝对的回答,实际上不少的史的写作,多经作者的主观逻辑化过程,对于本书,我也是抱定这一宗旨的。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,数百年的诸多作者,通过各种形式传播的作品,写史当然不能只是词人词作的描述,简单的相加,赏析的串帐;而鉴于词学实为“分门别类,务为专家”之学的事实,本书虽为唐宋词的艺术专史,却力图兼顾其他,有意于在“批评之学”的基础上写出图谱、音律、词韵、声调诸学构成的立体之“史”。从主观上说,是欲以系统工程的眼光和结构,打破以往各子学科间的藩篱,构建全面论述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门史,并力图体现出文献学、文艺学与文化学三结合的原则,欲在已见的关于唐宋词的研究成果之外,将清朝以来以律谱之学为代表的词的形式研究赋予现代意义,更对批评之学作全面、系统的整理,建立起评价较为客观、公正的体系。为此,尽力搜集古今的评论资料,汲取词学家所见,并以己见相统,努力做到判断准确,持论公允。本书首次将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写成专史,主于文学而兼及音乐,意在填补前述基础性研究的相对空缺。从词学学术史的角度言,应对传统词学领域有所发展、开拓,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延伸和提高,故力求做到旧学与新知相结合,使研究更为全面、系统,更加科学化。因此,在方法论上能注重多学科的结合,尤见于历史与文学的结合,文学与音乐的结合,传统批评与现代理论的结合。由于欲体现古与今相结合,词内与词外相结合的原则,本书的研究本着对词为“倚声”的认识,在词学领域探寻并描述文乐互为表里的规律,以及文、艺结合的特征,从而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,力求能还原古代文艺的生态,以及文艺之士的生存状态,出自心灵的感情倾诉。

就我自己的治学专长而言,因曾涉猎文化学、文化史、文艺美学和古代文论,故力图借助它们且作“内化”,以描述“史”的全貌。因此,全书以文化的发展、转换理论为枢纽,以之观照词由思想内容、表现手法,到艺术形式、创作风格、词人流派的主要变化,视之为主要的发展动因。提出的重要观点有:宫廷文化引发了文人词之起,进士文化促使了词之盛,边塞文化与民间多元文化使敦煌曲子词显著区别于文人词,西蜀与南唐因不同的宫廷文化背景而使词风相异,北宋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分别导致晏欧词与柳永词的雅、俗发展,苏轼的以诗为词是前者于词体变革的体现,故而是“士大夫之词”的完成,靖康的民族文化劫难引发了南渡词之变,坚持这一文化使南宋词“复雅”成为潮流,文化集成、南北综融是辛弃疾成为伟大词人的主要标识,江湖文化是风雅词派的生成基础,临安吟社文化则是宋季风雅词的生存土壤。相较而言,以上这些论述似乎新意较多,是我自己较为自信的。

本书意在弥补学界对唐宋词艺术体系研究的不足,拟将其置于我国古代诗歌发

展的流程中,作动态性的观照,力图体现出对龙榆生所下词学定义的探讨,即有意于“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,与词体之渊源流变,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”。在写完了百万字的书稿后,终于发现,由于词乐不存,加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,调谱之学治之极难,自己对“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”,是难以做得令人满意的。也因此体会到,为何吴梅先生临终前将耗时十年所成的《南北词简谱》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,委托得意门生卢前为之梓行,以期完成遗愿;也体会到从学于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先生的吴熊和教授所说的“词是专门之学”,是自有其特定涵义和真切感受的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我虽曾向音乐史、词曲史家洛地先生请教词乐、调谱等问题,却因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先天不足,难以学好、领会先生所赐论文、材料,有负先生的美意,确实感到惭愧。且不说图谱、音律之学,在拙著中,即使是论列各作者,亦多言其“利”与“得”,却少见其“病”与“失”。可知:要评判古人并非易事,打造能秤山之秤,自身又该有多少铜铁!更何况“同情之了解”实在又是知易而行难。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,是对唐宋词的发展、演进,多有全局性的宏观文化观照,有史的意识;在全面阅读词人作品的基础上,有自己的思考、比较,能联系历代论家的评论,择善而从,归纳出各词人在艺术上的特点和贡献。从总体而言,尚未离异艺术发展这一主题,大概在这一点上,还可以结合批评之学,为唐宋词的艺术发展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和总结。

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,被古人视作“小道”的词学已渐成“显学”,无论是文献整理还是研究著作,都出了大量成果。仅以影响较大的词史而言,就有杨海明的《唐宋词史》,刘扬忠的《唐宋词流派史》,陶尔夫、诸葛忆兵的《北宋词史》,陶尔夫、刘敬圻的《南宋词史》,邓红梅的《女性词史》等。其中杨、刘二位与我同辈,拙著的出版却分别较之晚了二十二年和十年,这是很令我惭愧的。按理说,拙著应该早就写出,却为何拖到今日呢?个中的主要原因是:内外的治学环境加上自己的兴趣屡转,使得我实际上离开词学已经较久。因此,本书的写成,应是我返回词学界、求取认同的表示。

词学界的朋友多以我是界内之人,其实我的治学很杂。三十年来,我先治近代曲论,很快就转到了唐宋词与词学批评,再转至古代诗画比较,接着再转古代文化与文艺。而转至文化与文艺宏观研究的原因是: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担任了研究生新专业“中国文化建设”的硕士生导师,为此,花了不少时间阅读文化学、文化史著作,且一度对图腾、民俗感兴趣,甚而企图从古史记载中寻找图腾制的遗迹,欲写作中国图腾艺术史。此事未果,却因对史前文艺与神话研究的兴趣,而有了对闻一多以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“研究之研究”成果。又因凭藉此此前所作诗画比较研究的基础,在完成了1992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中国古代诗画艺术思想史》之后,延伸出古代诗歌与绘画思想史的研究。先是出版了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,后因感到诗与画虽可比又不可比,自己应分别写作《中国诗歌思想史》与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二书。于是,先作后者,全书百万字,耗时四年才完成,而此时同事萧华荣的《中国诗学思想史》已出,加以拙著颇费周折的出版过程,使我不得不“以销定产”,调整为“诗歌艺术思想史”的选题终未进行。我这十多年来用力于几个方向的研究,其结果就是近十年间先

后出版的《学者闻一多》(与赵晓岚合著)、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、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、《宋代绘画研究》等著;而为了维持在学界先入为主的词学研究者形象,又有《宋词与人生》、《词学廿论》二著,再版了《唐宋词美学》与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(与方智范、高建中、周圣伟合著)。

虽疏离词学已久,又经历了从上海到广州的调动,却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,我终于能在拙著《唐宋词美学》的重印后记中,写下了这样一段结语:“家乡与故乡,母校与新校,我的思绪、感情常常在此间牵萦。而词学,是我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始点,应是始于斯又终于斯的!”这是近五年前所写,与其说是一个心愿,不如说是一种自励,而到本书的写成,又无异于是还愿了。

十六年前,先师万云骏教授抱病为《唐宋词美学》写序,回忆了当年在上海第二师范求学时,王饮鹤先生教自己读《水云楼词》和《蕙风词》的情况,并摘句以明何为“重拙大”,在肯定拙著同时,又指出:“若言尚有所憾,当是未及元明清三代词作”。倏忽间,先师墓木已拱,我也渐入老龄,在旁涉诸多研究领域后,因自己的不图专精、贪多务得而颇以为憾,更因未能在宋代以后之词下功夫,为有负于先师的期待而汗颜。如今自感入老年,力不从心,三代词作的研究当无以再及,因此,更是愧对以耄耋高龄尚勉力作晚清四大家年谱的马兴荣师。

诸葛亮《诫子书》有云:“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,遂成枯落。”读之而感慨良多!是为序。

邓乔彬

2009年2月12日